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

教育概论



jiaoyu gailun

吴俊升 王西征◎编著

主编◎瞿葆奎 郑金洲 特约编辑◎刘耀明

ershishiji zhongguo jiaoyu mingzhu congbian 福建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

教育概论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吴俊升 王西征◎编著

主编◎瞿葆奎 郑金洲 特约编辑◎刘耀明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教育概论/吴俊升, 王西征编著.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6.9

(20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

ISBN 7-5334-4529-5

I. 教… II. ①吴…②王… III. 教育学—概论
IV. G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2020 号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

教育概论

吴俊升 王西征 编著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电话: 0591-83725592 83726971
传真: 83726980 网址: www.fep.com.cn)

印 刷 泉州晚报印刷厂
(泉州市新华路 65 号 邮编: 362000)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39 千

插 页 2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100

书 号 ISBN 7-5334-4529-5/G·3462

定 价 17.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向出版科 (电话: 0591-83726019) 调换。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从编》书目

编著者及书目

王国维：《教育学》
张子和：《大教育学》
舒新城：《教育通论》
庄泽宣：《教育概论》
李浩吾：《新教育大纲》
陈科美：《新教育学纲要》
孟宪承：《教育概论》
钱亦石：《现代教育原理》
吴俊升、王西征：《教育概论》
孟宪承、陈学恂：《教育通论》
熊子容：《课程编制原理》
盛朗西：《小学课程沿革》
陈侠：《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
赵廷为：《教材及教学法通论》
俞子夷、朱晟旸：《新小学教材和教学法》
龚启昌：《中学普通教学法》
肖承慎：《教学法三讲》
吴俊升：《德育原理》
钟鲁斋：《教育之科学研究法》
陈选善：《教育研究法》
罗廷光：《教育科学纲要》
范寿康：《教育哲学大纲》
吴俊升：《教育哲学大纲》
张栗原：《教育哲学》
陶孟和：《社会与教育》

特约编辑

赵成亮
侯怀银
余维武
邓友超
喻立森
林存华
程亮
张美云
刘耀明
赵成亮
皇甫全、肖豫涵
徐玉珍、李玉珠
李臣之
刘家访
董远骞、董毅青
杨小微
章泽渊
黄向阳、秦艳
程胜
涂艳国、王卫华
郑金洲、朱丽
迟艳杰
程亮
范国睿、王加强
杨昌勇

- | | |
|-----------------|---------|
| 卢绍稷：《教育社会学》 | 张人杰 |
| 雷通群：《教育社会学》 | 吴康宁、胡金平 |
| 张栗原：《教育生物学》 | 朱家雄 |
| 艾 伟：《教育心理学》 | 王小明 |
| 萧孝嵘：《教育心理学》 | 皮连生 |
| 高觉敷：《教育心理》 | 缪小春 |
| 丘景尼：《教育伦理学》 | 黄向阳、吴黎辉 |
| 常导之：《增订教育行政大纲》 | 张济正 |
| 程湘帆：《中国教育行政》 | 吴志宏、汤林春 |
| 罗廷光：《教育行政》 | 孙锦涛、谢延龙 |
| 史襄哉：《教育卫生学》 | 朱家雄 |
| 王书林：《心理与教育测量》 | 王 权 |
| 沈有乾：《教育统计学》 | 张敏强 |
| 钟鲁斋：《比较教育》 | 赵中建 |
| 黄绍箕、柳诒徵：《中国教育史》 | 杜成宪 |
| 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 | 王伦信 |
| 陈青之：《中国教育史》 | 杜成宪、李世宏 |
| 陈东原：《中国教育史》 | 孙培青 |
| 王凤喈：《中国教育史》 | 姜国钧 |
|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 | 卢 浩 |
| 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 | 黄书光、张济洲 |
| 雷通群：《西洋教育通史》 | 单中惠 |
| 姜 琦：《现代西洋教育史》 | 陆敏福、刘荣飞 |
| 瞿世英：《西洋教育思想史》 | 余维武 |
| 蒋径三：《西洋教育思想史》 | 瞿葆奎 |

特藏

定審部育教

校學範師村鄉及校學範師

論概育教

升 俊 吳
徵 西 王

者 著 編



行 印 局 書 中 正

本书1935年于正中书局出版时的封面

出版说明

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从无到有,从译到著,形成了具有一定风格的体系。中国教育学者在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博采中西,融会古今,或独立编写教育学科教材,应迎中国师范教育之需;或自主撰述教育学科专著,夯实中国教育学术之基。皇皇百年,朵朵奇葩。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折射了时代精神的光芒,反映了教育学术的风貌,凝聚了教育学者的卓识。

站在世纪之交,我社思量有必要重树前辈们的精神财富。2003年春夏之交,我社副社长、副总编黄旭赴沪,力邀华东师范大学瞿葆奎先生和郑金洲教授担任主编,诚请老中青教育学者校注和介评,郑重推出《20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

辑入这套《丛编》的,皆历经了50年以上时间检验的、水平较高、影响较大、领学科风骚的著作。透过这些著作,试图展现20世纪中国教育学者的学术智慧,盘点中国教育科学的世纪历程,鉴往追来,在过去、现在、未来之间铺设中国教育科学的桥梁。这是一项承接前人、嘉惠后学的教育学术工程。

诚挚感谢主编及其工作集体、各册特约编辑的极大努力、各著作版权所有人的全面支持。

《丛编》选、编、校、印中的缺点、错误,敬恳读者批评指正。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6年8月

编校凡例

1. 选编范围。《20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以下简称《丛编》)选编20世纪经过50年时间检验的水平较高、影响较大、领学科一定风骚的教育著作。这些著作在学术上有承流接响的作用。

2. 版本选择。《丛编》以第一版或修订版为底本。在各册扉页前,附印原著的封面。

3. 编校人员。《丛编》邀请有关老、中、青学者,担任各册“特约编辑”,负责校勘原著、撰写前言(主要介绍作者生平与原著)。

4. 编校原则。尊重原著的内容和结构,以存原貌;进行必要的版式和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方便阅读。

5. 版式安排。原著是竖排的,一律转为横排。横排后,原著的部分表述作相应调整,如“左列”改为“下列”等等。

6. 字体规范。改繁体字为简化字,改异体字为正体字;“的”、“得”、“地”、“底”等副词用法,一仍旧贯。

7. 标点规范。原著无标点的,加补标点;原著标点与新式标点不符的,予以修订;原文断句不符现代汉语语法习惯的,予

以调整。原著有专名号（如人名、地名等）的，从略。书名号用《 》、〈 〉规范形式；外文书名排斜体。

8. 译名规范。原著外国人名、地名等，与今通译有异的，一般改为今译。

9. 数字规范。表示公元纪年、年代、年、月、日、时、分、秒，计数与计量及统计表中的数值，版次、卷次、页码等，一般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中国干支等纪年与夏历月日、概数、年级、星期或其他固定用法等，一般用数字汉字。此外，中国干支等纪年后，加注公元纪年。

10. 标题序号。不同层级的内容，采用不同的序号，以示区别。若原著各级内容的序号有差异，则维持原著序号；若原著下一级内容的序号与上一级内容的序号相同，原则上修改下一级的序号。

11. 错漏校勘。原著排印有错、漏的，进行校勘。

12. 注释规范。原著为夹注的，仍用夹注；原著为尾注的，改为脚注。特约编辑补充的注释（简称“特编注”），也入脚注。

中国教育学科的百年求索

——《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代序

20世纪是中国教育学科艰难创生、曲折发展的世纪。伴随着中与西的文化激荡，传统与现代的思想交融，中国教育学科逐渐地从译介走向编著，从移植走向创生，从草创走向发展。教育学者们百年来以执着的精神、笃实的态度、质朴的思维，成就了中国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世纪篇章。站在21世纪的门槛里，隔着时间的距离，回眸这段历程，不仅能窥视中国教育学科所沐浴的阳光，更能体味到她所历经的风雨。

—

教育思想史与教育学科史，不是两个“等价”的概念。在中国，教育思想史可以上溯到两千多年以前，但是教育学科史迄今却不过短短百余年的历程，而启动这一历程的是以日本为媒介的“西学”引介。促动这些引介的直接动因，还是新办师范学堂的课程“急需”。当年，所谓“办理学堂，首重师范”，而“教育为师范学堂之主要学科”。中国教育学科的历史和师范院校的发展乃唇齿相依。之所以借道日本取法“西洋”，主要是因为中日地

理毗邻、文化同源。清末张之洞就说：“致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费省，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①一时间，清廷公派、民间私往日本的学生甚众，多攻读师范速成科。这些学生归国后，又有不少成为师范学堂的译员或教习，成为引介教育学科的主要先驱。他们以译书立说为要务，广揽教育学说，拓展国人视界，推进了教育学人的思想“启蒙”，以及教育学科的学术“建制”。

在中国教育学科史上，1901年是个值得珍视的时段。就在这年，罗振玉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教育专业杂志——《教育世界》；王国维译介了第一本完整的教育学著作——立花铨三郎讲述的《教育学》。这本著作连载于《教育世界》第9~11号，被视为“教育学”在中国的始点。但在此前，还有两门教育学科分支的著作先行引入中国，即是：田中敬一编、周家树译的《学校管理法》（载《教育世界》第1~7号）；三岛通良著、汪有龄译的《学校卫生学》（载《教育世界》第1~8号）。其后，《教育世界》又先后刊载了汤本武比古著、王国维译的《教授学》；原亮三郎编、沈弘译的《内外教育小史》。1902年，木场贞长著、陈毅译的《教育行政》付梓。中国教育学科的园地又添了“新蕊”。

上述著作都是所谓“进口货”，说的是他域的教育，解的是他国的问题，终究不能替代国人自己的“言说”。在引进、积累之后，国人就尝试立足中国实际，兼蓄西方理论，自编相关教育学科的著作，从而迈出了国人自主“治理”教育学科的最初步伐。朱孔文编的《教授法通论》（时中学社，1903），王国维编的

^①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

《教育学》（教育世界社，1905），蒋维乔著的《学校管理法》（1909），黄绍箕和柳诒徵著的《中国教育史》（1910）^①，袁希洛编的《教育行政数日谈》（1912），俞庆恩著的《学校卫生讲义》（上海江苏教育会，1915）等等，都称得上是各自领域的“先行者”。与同期的译作相比，这些著作在“量”上相当有限，在“质”上尚显稚嫩，但也不乏融合本土经验的作品。这是一个“方长、方成”的时期。总体来说，清末民初的教育学科体系，无论是内容还是结构，都深受赫尔巴特及其学派（Herbart and Herbartians）的影响，同时也符合当时师范课程设置的要求。这意味着，“理论”的驱动和“实践”的需要，构成了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原初动力。

随着社会政制的更替、教育情势的发展，尤其是在西方的留学生归国，杜威（J. Dewey）以及孟禄（P. Monroe）、麦考尔（W. A. McCall）等访华的直接推动下，中国教育学科发展的“风向标”由“中道”日本转向“直捷”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教育科学化”运动，冲击了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思辨教育学，初步建立了经验科学的教育学，即所谓单数“教育科学”（educational science）^②。与此同时，教育学在与心理学、伦理学、生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认真说来，这里的

① 一说为1902年。见孟宪承、陈学恂、张瑞璠、周子美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14页。

② 1798年，德国教育学家里特（K. Ritter）在《由教育学批判以证明普遍教育科学之必要性》（*Kritik der Pädagogik zum Beweis der Notwendigkeit einer allgemeinen Erziehungswissenschaft*）中，明确提出了“教育科学”（*Erziehungswissenschaft*）概念。见黄向阳：《教育知识学科称谓的演变：从“教学论”到“教理学”》，载瞿葆奎主编：《元教育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学科”是“科学”。下同)的双向渗透中,又衍生出一批交叉性或边缘性的教育学科分支,形成了所谓复数“教育科学”(educational sciences)概念^①。这一概念意味着大量社会学科,还包括某些自然学科,应用于教育领域所形成的分支学科群。大抵在20世纪20年代及稍后,这些分支先后在中国“登陆”,于是建立了现代教育学科的一定体系。与清末民初相比,这一时期译介尚盛,但已不及国人著述的规模,而且“登陆”的方式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有些仍然走的是先译介后编著的路线,如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等;有些是先有国人编著,而后又引介西方的相关著述,如教育哲学、教育统计学等;还有些仅有国人的编著,似未见引进相关的学科性著作,如教育伦理学、教育生物学等。可略列表举例如下:

1919~1949年国人早期译介和编著的部分教育学科著作^②

| 教育学科 | 早期的学科著作 | 国人早期译介的学科著作 | 国人早期编著的学科著作 |
|------|--|-------------------------------|---------------------------|
| 教育哲学 | 1904年,霍恩(H. H. Horne)著《教育哲学》(<i>Philosophy of Education</i>) | 1924年,豪恩(霍恩)著、周从政译述《教育哲学》(中华) | 1923年,范寿康著《教育哲学大纲》(中华学艺社) |

^① 1912年,瑞士心理学家克拉帕雷德(E. Claparède)在日内瓦指导一个教育心理学研讨班时,明确提出了复数“教育科学”(la sciences de l'éducation)概念。

^② 侯怀银:《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学发展问题的反思》(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瞿葆奎主编,瞿葆奎、沈剑平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黄向阳:《教育伦理学辨——兼析教育问题的哲学反思》(华东师范大学1994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承绪主编:《比较教育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等等。

| | | | |
|-------|--|--|------------------------------|
| 教育伦理学 | 1897年,杜威著《教育伦理学》(<i>Educational Ethics; Syllabus of a Course of Six Lecture-Studies</i>)、《构成教育基础的伦理原则》(<i>Ethical Principles Underlying Education</i>) | | 1932年,丘景尼编《教育伦理学》(世界) |
| 教育社会学 | 1917年,史密斯(W. R. Smith)著《教育社会学导论》(<i>An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Sociology</i>) | 1918~1919年,史密斯著、刘著良译《教育社会学导言》(载《安徽教育月刊》) | 1922年,陶孟和编《社会与教育》(商务) |
| 教育生物学 | | | 1947年,张栗原编《教育生物学》(文化供应社) |
| 教育心理学 | 1903年,桑代克(E. L. Thorndike)著《教育心理学》(<i>Educational Psychology</i>) | 1921年,哥尔文、沛葛兰著,廖世承译《教育心理学大意》(中华) | 1922年,舒新城编《教育心理学纲要》(商务) |
| 教育统计学 | 1904年,桑代克著《心理与社会测量》(<i>Mental and Social Measurements</i>) | 1928年,塞斯顿著、朱君毅译《教育统计学纲要》(商务) | 1922年,薛鸿志著《教育统计学大纲》(北高师编译部) |
| 教育测量学 | | 1927年,杜佐周编译《麦柯教育测量法撮要》(民智书局) | 1922年,张秉波、胡国钰编《教育测量》(北高师编译部) |

| | | | |
|-------|--|------------------------------|---------------------------------|
| 比较教育学 | 1817年,朱利安(M. -A. Jullien De Paris)著《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与初步意见》(<i>Esquisse et vues préliminaires d'un ouvrage sur l'éducation comparée</i>) | 1917年,余寄编译《德英法美国国民教育比较论》(中华) | 1929年,庄泽宣编《各国教育比较论》(商务) |
| 课程论 | 1918年,博比特(F. Bobbitt)著《课程》(<i>The Curriculum</i>) | 1928年,波比忒(博比特)著、张师竹译《课程》(商务) | 1925年,余家菊著《课程论》(《中华教育界》第19卷第9期) |
| | | | |

其实,这种学科分化的景象,从《中国教育辞典》(中华,1928)和《教育大辞书》(商务,1930)这两本有影响的教育专业辞书中就可窥见一斑。除了学校管理学、学校卫生学以外,它们还收录了教育哲学、教育论理学、教育伦理学、教育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病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学等辞目。从形成机制来看,这些学科主要集中在两类:一类是以“他学科”为理论框架,分析教育活动中形而上的、社会的或个人的问题;另一类是研究如何运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教育活动的学科。它们的涌现,既反映了20世纪初叶西方教育学科“科学化”的基本成果,同时顺应了国际教育学科分化的总体趋势。有些学科诞生不久,便在中国教育学科的殿堂里占得了席位。

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这些初具形态的教育学科接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在“以俄为师”、“全面学习苏联经验”的号召下,这种改造逐渐演变成按照苏联教育学科体系加以规划。中国的教育学科只开一扇“北门”,在数量上大为收缩,

仅留下了教育学、心理学、各科教学法、教育史等学科；在内容上倒向了苏联教育学者的研究成果，禁闭或批判了西方学者的教育理论。中国教育学科经历了一次“血透”。“引进”又一次成了教育学科建设的主题，而重点在译介苏联的“教育学”教材，如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奥哥洛德尼柯夫和申比廖夫著的《教育学》、叶希波夫和冈察洛夫著的《教育学》等等；虽逐渐有些结合中国实际的自编教育学科教材，但框架上，甚至内容上基本是苏联教育学科的“复制”。这是一种“大教育学”的体系，它不仅使自身背负上“沉重的翅膀”^①，而且砍宰了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等分支学科。与这种“论”的“教育学”相映衬的，主要是教育史学科的建设。在外国教育史方面，先是翻译了麦丁斯基的《世界教育史》，康斯坦丁诺夫、麦丁斯基、沙巴也娃的《教育史》等等；而后又改编和自编了一些外国教育史的教材；在中国教育史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挖掘和整理一些资料，编写了一些教材和讲义，并在学科体系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这些学科探索，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确立适合新中国教育需要的学科体系。但是，在1949~1966年间形成的这些断续的、局部的、零星的、有限的学科建设成果，随着“文革”的到来，迅速淹没在一统的“语录化”教育表述之中。这是不堪回首的当年，又是必须回首的当年。它给中国教育学科史添加了一些史无前例的、苦难的、独特的国际笑料。这建国后17年的教育学科建设，也全部被批斗并付之东流！

历经了三十年的曲折或中断，中国教育学科的“家园”百废

^① 陈桂生：《教育学的迷惘与迷惘的教育学——建国以后教育学发展道路侧面剪影》，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年第3期。

待兴。恰恰在这段岁月里，随着跨学科或多学科的研究日盛，教育学与经济学、政治学、未来学、技术学等学科的相互沟通渐密，西方教育学界又迎来了教育学科分化和发展的新高潮。在开放的背景下，从苏联因袭而来的“大教育学”体系，不仅与国际教育学科分化的整体趋势相悖，而且难以适应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冲破这种“大教育学”体系，建立教育学科分支体系，成为当务之急。首先是恢复和重建一些教育学科，如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教育行政学等；其次是新建一些中国教育急需的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政治学、教育法学、教育文化学、教育生态学、教育评价学等等。除了重点译介西方的教育学科成果以外，编写相关的学科著作，建立专门的研究学会，开设专业的教育课程，等等，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学科体系的建设。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教育学科“自我意识”的觉醒，两门以教育理论本身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元教育学和教育学史，逐渐进入了中国教育学者的视野。其中，差不多每门教育学科都拥有若干中国人自主撰述的著作，从这百花丛中，似乎可以窥见中国教育学